

中国革命史 研究述评

主编 曾景忠



河北人民出版社

07

目 录

十年来中共党史研究的回顾与展望·····	马齐彬 王秀鑫(1)
中国共产党创建史研究述评·····	邵维正(21)
第一次国共合作研究情况综述·····	黄修荣(49)
土地革命初期各地武装起义研究述评·····	王荣先(64)
土地革命时期农村革命根据地研究	
综述·····	张培林 黄少群(82)
红军长征史研究述评·····	曾景忠(129)
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研究述评·····	李良志 王树荫(161)
敌后抗日战场研究述评·····	何 理(203)
抗日根据地史研究述评·····	魏宏运(241)
全国解放战争史研究述评·····	田为本(271)
中国民主党派史研究述评·····	李起民 田雨华 刘胜兰(283)
民主革命时期工运史研究述评·····	刘晶芳(301)
中国青运史研究工作综述·····	郑 洸(323)
中国妇女运动史研究概况·····	李静之 黄晓瑜(364)
共产国际与中国革命关系研究评述·····	杨奎松(367)
毛泽东思想研究述评·····	陈登才 王红续 李欣欣(399)
后 记·····	(431)

十年来中共党史研究的 回顾与展望

马齐彬 王秀鑫

—

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后，中共中央十分重视在全国范围内开展学习和研究中共党史的工作。1950年，中共中央马列学院在教学中，开设了中共党史课程。1951年，南京军事学院各班级，普遍开设了中共党史课，并被指定为一门主课。1951年6月，胡乔木的《中国共产党三十年》出版，1951年10月、1952年3月和1953年2月，《毛泽东选集》第一、二、三卷先后出版发行。其间，中国人民大学于1952年举办中国革命史研究班，为高等院校培养中共党史教员。从1953年秋开始，全国各高等院校普遍开设了中共党史（或中国革命史）课程，并把它列为马克思列宁主义理论教育的一门重要课程。随着《毛泽东选集》和《中国共产党三十年》的出版发行，以及高校中共党史课的设置，在全国形成了学习和宣传党史的热潮，中共党史的研究工作也逐步展开了。为培养中共党史方面的专业人材，中国人民大学专门设置了中共党史学系。

50至60年代，编辑、出版中共党史资料的工作，取得了一定成果。编写的中共党史教材和讲义有：何干之主编的《中国现代革命史讲义》和《中国现代革命史》（上、下册）；李新等主编的

《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通史》；中共中央党校中共党史教研室编的《中国共产党历史讲授提纲》；胡华主编的《中国革命史讲义》；北京市高等学校党史讲义编写协作小组编著的《中国共产党历史讲义》；王实等编的《中国共产党历史简编》；徐元冬等编的《中国共产党历史讲话》；廖盖隆编著的《中国人民解放战争简史》；黎澍编著的《马克思主义与中国革命》；缪楚璜编写的《中国共产党简要历史》等等。编辑、出版的中共党史资料有：中共中央办公厅再版的延安时期中共中央书记处编印的《六大以前——党的历史材料》和《六大以来——党内秘密文件》；中共中央宣传部编辑的《中共党史资料》和以活页形式在内部发行的《中共党史教学参考资料》；胡华编的《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史参考资料》；中国人民大学中国革命史教研室编辑的《中国革命史参考资料》（共四集）；中国现代史资料编辑委员会翻印的延安时事问题编辑会编辑的《抗战的中国丛刊》（包括《“九·一八”以来国内政治形势的演变》、《抗战中的中国经济》、《抗战中的中国政治》、《抗战中的中国军事》、《抗战中的中国文化教育》）；中国史资料编辑委员会翻印的延安解放社编辑出版的《战争中的日本帝国主义》；人民出版社重版的《抗日战争时期的中国人民解放军》（原名《抗战八年来的八路军和新四军》）和《抗日战争时期解放区概况》（原名《中国敌后抗日民主根据地概况》）；50年代出版发行的《远东国际法庭判决书》；中国科学院历史所第三所编辑的《陕甘宁边区参议会文献汇辑》；商务印书馆编辑的《我国资产阶级对于中国现代史的看法》等等。此外，党史工作者还在《人民日报》、《学习》、《红旗》等报刊上发表了一些研究中共党史的文章。

这期间中共党史的教学和研究，分析了半殖民地半封建的中国社会的基本特征，指出了帝国主义和封建主义是中国社会发展的桎梏，代表大地主大资产阶级的国民党反动派企图在中国实行封建法西斯统治；论述了中国共产党从成立到领导中国人民夺取

新民主主义革命胜利的全过程，以及领导中国基本完成社会主义改造的情况；反映了毛泽东思想的产生、形成和发展的历史过程；阐明了中国共产党关于“统一战线、武装斗争、党的建设”的基本理论；记载了中国共产党和广大人民群众密切联系的“鱼水关系”以及中国共产党的优良传统和优良作风的形成过程；论证了“没有中国共产党，就没有新中国”和“没有中国共产党，就没有社会主义”的历史规律性。通过中共党史的教学和研究，使广大干部和知识青年对中国共产党有了比较系统的了解，提高了学习和运用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的自觉性和理论水平。

但是，这时中共党史的教学和研究也存在着一些缺点。主要是突出个人，以叙述毛泽东的活动和介绍毛泽东的著作为主要内容；阐发理论观点多，记述具体史实少；研究领域不够广泛，“空白”多，禁区多，许多重大问题没有进行探讨和研究；教学和研究工作中贯彻历史唯物主义原则不够，有的历史结论过于简单，特别是50年代后期开始出现的“左”的思潮，对中共党史的研究也产生了不利影响。

“文化大革命”期间，中共党史的宣传和研究工作步入歧途。林彪、“四人帮”歪曲篡改党史，当时，只有《中国共产党两条路线斗争史讲义》一书风行一时，这本书把中国共产党为中国人民的解放事业而英勇斗争的可歌可泣的历史，说成是党内两条路线斗争史，在广大群众中产生了很坏的影响。由于林彪、“四人帮”以假乱真，使中共党史的面目全非，极大地降低了中共党史这门学科的名誉。

二

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中共党史的教学和研究工作进入一个新时期。10年来，在“实事求是，解放思想”方针的指引

下，中共党史的研究转入了拨乱反正的轨道，取得了较大的进展。这10年，可以说是中共党史研究大踏步前进的10年，主要表现在五个方面。

第一，中共党史研究领导机构的设立，研究队伍的发展和刊物的创办。

1980年1月29日，中共中央成立有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叶剑英、邓小平、李先念、陈云、聂荣臻、邓颖超等同志参加的党史委员会。同日，成立党史编审委员会，委员有胡耀邦、彭真、粟裕、胡乔木、陆定一、李维汉、程子华、杨尚昆、王鹤寿、安子文、姚依林、冯文彬，共12人。1980年5月，中共中央正式成立文献编辑委员会，并将原毛泽东著作编辑委员会办事机构（简称“毛办”）改名中央文献研究室，负责收集、编辑、研究中共党史和当代的重要文件，编辑出版党和国家主要领导人的著作。1980年7月1日，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和中共中央党史资料征集委员会正式建立，它们是中共中央党史委员会和党史编审委员会的办事机构，负责中共党史有关问题的研究工作和党史资料征集工作。接着，各省（市）、军区建立了中共党史工作委员会，许多地、县也建立了党史工作机构。1988年3月31日，中共中央决定，在中央书记处下，设中央党史领导小组，以杨尚昆为组长，胡乔木、薄一波为副组长。1988年8月1日，中共中央委员会又决定，撤销原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和中共中央党史资料征集委员会，组建新的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中共中央关于党史机构设置的一系列决定，表明了党中央对中共党史研究工作的重视，加强了对这项工作的集中统一领导。

早在1980年7月18日，全国中共党史研究会就宣告成立。全国中共党史研究会是在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的指导下，联系全国各地各系统的党史研究工作者的群众组织。之后，各省（市）也相继成立了党史研究会。有的地区，还成立了党史专题研究会，

如新四军和华中抗日根据地研究会、东北抗日联军史研究会、太行革命根据地研究会，等等。10年来，从事中共党史教学和研究的队伍，有了较大的发展。到目前为止，有六个系统：中央和各省（市）党史机构的研究人员；中央和省（市）、地、县党校的党史教学和研究人员；军事院校、军事科研部门党史教学和研究人员；高等院校的党史教员和研究人员；社会科学院中共党史研究人员；中央和各省（市）档案馆的党史研究人员。据估计，全国从事党史教学和研究的约有两万多人。此外，还有许多离、退休老干部积极参与此项工作。

为了推动中共党史研究与教学工作的开展，中共中央党校于1980年1月创办了《党史研究》。到1987年底，共出版48期；1981年1月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创办了《党史资料通讯》，1983年1月，该刊改名为《党史通讯》，到1987年底，共出版126期；1982年4月，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创办了《文献和研究》，到1987年底，共出版51期。此外，中央档案馆、中国社会科学院、军事科学院、革命博物馆、军事博物馆也创办了有关中共党史、中国革命战争史的刊物。各省（市）也创办了中共党史刊物。从1988年起，《党史通讯》与《党史研究》合并，改名为《中共党史研究》，由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主办；《文献和研究》与《中央档案馆丛刊》合并，刊名改为《党的文献》，由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和中央档案馆主办。中央和各地方不少中共党史刊物的创办，为开展党史研究提供了良好的条件。

第二，编辑、撰写和出版了相当数量的中共党史文献档案、历史资料、回忆录、专著和论文。

10年来，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辑了毛泽东、周恩来、刘少奇、朱德、邓小平、陈云、任弼时等的选集系列。1978年冬至1979年春，人民出版社将原中共中央宣传部以活页形式内部发行的《中共党史教学参考资料》重印，并汇集成三辑。1979年4月至1980

年1月,人民出版社出版了中共中央党校党史教研室编辑的《中共党史参考资料》(8册)。1980年,人民出版社又重印了中央档案馆对错别字作了补正的《六大以前——党的历史材料》和《六大以来——党内秘密文件》。1981年,经中共中央书记处批准,由中央档案馆选编的一部大型的《中共中央文件选集》开始出版,迄今已出版14集,包括1921年至1949年9月30日的历史文献。1982年春,中共中央党史资料征集委员会编辑的《中共党史资料》开始出版,现已出版28辑,这部书以刊载新征集到的重要党史资料为主。1979年,中国人民解放军政治学院党史教研室曾编印《中共党史教学参考资料》1~11册,近年来他们又作了增补,付印了12~32册。10年来,各种专题资料也在着手编辑和陆续出版。中央档案馆编辑的《北伐战争》、《南昌起义》、《皖南事变》等专题资料,已经出版。中共中央党史资料征集委员会和各地、各单位合作编辑的专题资料丛书,计划编辑出版100余本,现在已出版的有《遵义会议文献》、《八七会议》等20余本。此外,中共中央有关部门和各省(市)也编辑出版了一批中共党史资料。如:《中共中央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文件选编》、《东北抗日联军史料》、《陕甘宁革命根据地史料选辑》、《晋察冀抗日根据地史料选编》、《晋冀鲁豫抗日根据地资料选编》、《新四军和华中抗日根据地史料选》、《国民参政会记实》,等等。

这些年来,许多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对自己所经历的历史事件和革命活动进行了回顾与思考,一部又一部的回忆录相继出版问世。其中有:《聂荣臻回忆录》,徐向前的《历史的回顾》,《吴玉章回忆录》,李维汉的《回忆与研究》,《何长工回忆录》,王首道的《忆南征》等等。

1981年,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编写了内部发行的《中共党史大事年表》,1987年,又公开出版。该书勾画出了中共党史的大致轮廓,实际上是一本简要的编年体的中共党史。中央党史研

究室经过几年的工作，已经写出《中国共产党历史讲义》（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的初稿，现正作进一步修改。1981年至1984年，人民出版社出版发行了中共中央党校党史教研室李践为主编的《中国共产党史稿》第一、二、三、四分册。1987年，中国人民解放军军事科学院军事历史研究部编写出版了《中国人民解放军战史》第一、二、三卷。1980年5月，中共党史人物研究会编辑的《中共党史人物传》开始问世，迄今已发行37卷，并将继续出版。10年来，中共党史界的专家学者，还撰写出版了不少通史性的中共党史著作，并出版发行了几十本专史。如：《抗日战争史稿》、《抗日战争史》、《西安事变简史》、《湘西革命根据地史稿》、《东北抗日联军史》、《太行革命根据地史稿》、《琼崖纵队史》、《中央革命根据地史》、《中国人民志愿军抗美援朝史》等等。

除专著外，10年来，党史工作者发表了大量党史专题研究的论文。据不完全统计，在1982年至1986年5年间，在中央、省（市、自治区）报刊上发表的中共党史论文有13,330余篇。其中，1985年为纪念抗日战争胜利40周年发表的论文就有846篇。这些论文的内容相当广泛，概括起来有：关于中共党史各个阶段党的方针政策、历史事件、人物的研究；关于历史资料的考证和研究；关于毛泽东思想的形成和发展的研究；关于统一战线、武装斗争、党的建设“三大法宝”的研究；关于国共两党合作及破裂的经验教训的研究；关于革命根据地的开辟、发展和建设的研究；关于民族革命和民主斗争关系的研究；关于共产党与民主党派合作的研究；关于党的优良传统的研究；等等。

文献资料、回忆录、专著的较多出版以及大量的党史专题论文的发表，为科学地、准确地撰写中共党史提供了重要条件。

第三，贯彻“双百方针”，活跃了中共党史研究的学术空气。

从1981年起，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和全国中共党史研究会，每年都组织一次全国性的中共党史专题学术讨论会，并经常举办

中共党史和中国革命史讲习会，研讨党史界关心的问题和疑难问题，培养从事中共党史研究的队伍。此外，各省（市）党史工作委员会和党史研究会也定期或不定期地请一省、数省或全国党史工作者进行专题学术讨论，讨论的问题更加广泛。这些年来，党史界先后对以下问题开展了学术讨论：土地革命战争时期的根据地问题；毛泽东思想的形成和发展问题；抗日战争时期的敌后战场问题；抗日战争的领导权问题；北伐战争的领导权问题；武汉革命政府的性质问题；西安事变问题；“七七”抗战问题；中国工农红军长征的问题；第二次国共合作问题；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党的城市工作问题；渡江和南京解放问题；基本完成社会主义改造时期的有关问题；开始全面建设社会主义时期的有关问题；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新时期的有关问题；等等。

通过贯彻“双百”方针，活跃学术空气，逐步克服了中共党史研究中的“左”的思想影响。党史工作者在讨论中，根据“各抒己见、畅所欲言、尊重史实、服从真理”的原则，弄清了许多重要的历史事实，增强了党史研究的科学性。

第四，冲破了中共党史研究中的一些“禁区”。

在过去的党史研究中，由于种种原因，对一些比较重大的问题，不敢涉及。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冲破了这些“禁区”。特别是近年来，日、美、苏、欧洲以及港台出版的大量有关中共党史的论著和资料，评述了这些以往未曾涉及的问题，发表了若干以往未曾公开的档案资料。这类出版物，不少具有一定的学术价值和史料价值，但往往就此对我党历史进行种种歪曲。在这种情况下，组织党史工作者，本着“实事求是、照顾大局、不纠缠细节”的方针，冲破“禁区”，对于党史上一些重大的政治历史问题进行研究，更是十分必要的。

其一，关于共产国际与中国革命关系问题的研究。为了深入开展这项研究，交流学术成果，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和全国中共

党史研究会先后召开了五次共产国际与中国革命关系问题学术讨论会，并多次将提交会议的论文选印成文集，作为《党史通讯》增刊出版。经过对共产国际与中国革命关系的全过程的讨论，党史工作者的认识是：共产国际对中国革命的指示和作用应当一分为二；共产国际帮助了中国共产党的建立，中国共产党是共产国际的一个支部，按照规定，对它的一切决议，作为下级的中国共产党必须执行，共产国际在促成第一、第二次国共合作中，起了积极的作用，有过正确的指示；但共产国际的许多指示，都脱离了中国国情，常常是错误的，中国共产党在1927年和1934年的两次严重失败，都和共产国际的指导有关；抗日战争时期王明的右倾直接来源于共产国际，然而在纠正王明的右倾错误中，共产国际又起了重要作用。

其二，关于对“AB团”、“社会民主党”的斗争和富田事变问题的研究。自1983年以来，江西、福建、安徽、湖北等省党史部门，公安部、中央组织部作了大量细致的调查研究工作，基本弄清了这方面的问题。结论是：“AB团”在1927年4月已经解体，“社会民主党”在中国从未存在过，故苏区肃清“AB团”和“社会民主党”的斗争是臆测和逼供信的产物，混淆了敌我，造成了许多冤、假、错案；1930年12月，红军总前委根据中央多次指示精神和一些同志在逼供下的假口供，派人到红二十军进行肃清“AB团”的斗争，于是红二十军少数领导人由此发动了富田事变，提出分裂中央红军领导的口号，苏区中央局曾决定采取解决党内矛盾的方法处理这次事变，但中央代表团根据中央政治局关于富田事变的决议，认定是“反革命行动”，致使红二十军很多干部被处决，造成了不可挽回的损失。

其三，关于抗战胜利前后苏联对中国革命的影响问题的研究。过去，党史研究只讲苏联对中国援助的一面，不说苏联的问题一面。后来，中苏关系破裂，有些同志又片面批判苏联大国沙

文主义、狭隘民族主义一面，不说苏联援助中国的一面。近年来，党史工作者经过研究后认为，苏联支持和援助了中国的抗日战争，但1945年2月苏、美、英三国政府首脑签订的雅尔塔协定关于中国问题的条款，损害了中国的主权；抗战胜利后，苏联的存在及维护世界和平的斗争，是中国革命有利的国际环境，但当时苏联由于过高估计美国直接卷入中国内战的可能性和危险性，过低估计中国人民的革命力量，为了寻求对美妥协，不积极支持中国人民推翻国民党反动统治的革命战争。

此外，在冲破党史研究的“禁区”方面，还研究了延安整风时期的“抢救运动”、“百团大战”、“宁都会议”、“赣南会议”、中美关系等问题。通过对“禁区”问题的探讨，增强了党史研究的准确性、科学性；有力地驳斥了国外或港台某些书籍对中共党史的歪曲；解决了现实工作中需要解决的问题。例如，在搞清“AB团”、“富田事变”的历史情况后，江西、福建、安徽、湖北、公安部、中组部为在富田事变和苏区反“AB团”中被错误处理的同志平反昭雪，这对教育广大干部和人民，起了积极作用。

第五，拓宽了中共党史研究的领域。

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的主要斗争形式，是武装斗争，但没有武装斗争以外的各种形式的斗争的配合，武装斗争就不能取得胜利，武装斗争和白区工作是新民主主义革命取得全国性胜利的缺一不可的两条战线。过去的党史研究注重了武装斗争这条战线，却忽视了作为另一条战线的白区工作。这种情况，影响了党史著述的全面性和准确性。10年来，将白区党史资料的征集和研究工作提到了重要地位，是一个可喜的进步。

例一，抗战初期，为了发展南方各省的抗日运动，推动国民政府的改革和进步，中共中央决定建立中共中央长江局，并组成中共中央代表团赴武汉工作。后经两个组织的联席会议决定，二者合一，对内为长江局，对外为中共代表团，王明为长江局书

记。对于长江局在武汉将近一年的工作，过去是一概否定，认为王明右倾投降主义统治了长江局。近几年，党史工作者搜集了大量资料，肯定了长江局的历史功绩，迅速恢复和建立了南中国各地区的中共组织；出版《新华日报》，宣传抗日主张，组织抗日救亡运动；组建新四军，培训指挥游击战的干部；代表中共中央对国民党和民主党派进行统战工作。同时也研究了长江局受王明右倾影响和工作中的错误，认为主要是：对开展敌后抗日游击战争，特别是建立抗日根据地，重视不够，影响华中敌后抗战的更大发展；贯彻全面抗战路线和独立自主原则不够坚决。

例二，中共中央南方局是1939年1月至1946年5月中共中央派驻国民党统治中心——重庆的代表机构，在长达7年多的时间里（抗日战争时期和解放战争初期），在国民党统治区做了许多卓有成效的工作。南方局的历史，是中共党史的一个很重要的方面。然而，过去党史研究中注重不够。近几年来，在中共中央南方局党史资料征集小组的领导下，南方各省广大党史工作者查阅、整理了大量有关南方局工作的文献资料和历史档案，摘录研究了当年的报刊杂志，一部分原在南方局工作过的老同志，还聚集一起对南方局工作的史实进行反复核实。1986年5月，南方局党史资料丛书之一——《大事记》已经出版，其它部分：《党的建设》、《统一战线》、《文化工作》、《群众工作》、《军事工作》的资料，已编辑就绪。南方局党史资料的编辑出版，为进一步研究南方局的历史打下了基础。

此外，近几年来，中共中央北方局、南京局、上海局的历史，也正在进行研究。

在中国共产党将近70年的历史中，属于民主革命时期的只有28年，一半以上的时间属于新中国诞生后的历史。党史研究不能停留在只研究前28年的历史。但是，党史工作者过去侧重于研究1956年党的“八大”以前的历史，对于“八大”以后的历史却很少问津。自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特别是党的十一届六中

全会通过了《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后，党史工作者开始注意对建国以来党史的研究。党史专业刊物不断公布建国后党的文献和发表研究社会主义时期党史的文章；全国党史研究会多次举行了关于建国以来党史的专题学术讨论会；党史教学也增加了党的“八大”以后的内容，中共中央党校编写的党史教材讲到党的“十二大”；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出版了《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注释本》；在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出版的《中共党史大事年表》中，建国以后的党史占了很大的比重。目前，党史工作者正在根据党的“十三大”提出的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理论，把微观的研究和宏观的研究结合起来，进一步深入地研究建国以来党的历史。

三

为着进一步深入开展中共党史研究，当前，党史工作者除继续讨论各个历史时期的问题外，最关心的是关系党史全局的一些问题，并展开了讨论。

第一，关于《联共（布）党史简明教程》对中共党史教学和研究的影晌问题。

党史界普遍认为，自从1939年《联共（布）党史简明教程》中译本传入中国后，长时期里被列为干部学校、高等院校的必读教材之一，因而它对中共党史教学和研究的影晌是很深的。究竟有哪些影响呢？党史工作者肯定了《联共（布）党史简明教程》对中共党史教学和研究的影晌，发生过好的影响。他们认为：该书在语言文字和叙述方法上，非常简明流畅，叙事生动，且大部分史论结合，使人容易接受，给人以深刻印象；在内容上，叙述了马克思主义普遍原理同俄国革命具体实践相结合，对于列宁的一些主要著作产生的历史背景及中心内容，介绍得比较清楚，对读者学

习列宁著作有帮助。因而这本书对在中国传播马克思列宁主义基本知识，起过积极的作用。因此中共党史研究以该书为范例，以马克思主义的普遍原理同中国革命具体实践相结合为主线，基本上是对的。

但是，《联共(布)党史简明教程》对中共党史研究也有着很大的消极影响。(1)《联共(布)党史简明教程》以领袖的著作和活动为重点，夸大和神化了列宁、斯大林的作用。全书许多地方连篇累牍地介绍列宁、斯大林的著作，叙述他们的活动，并把斯大林的一些错误理论和活动说成是正确的，宣扬斯大林个人高度集权的社会主义模式，对党的集体领导和其他领导人的活动介绍得很少。由于这样处理领袖人物的影响，致使中共党史教材相当大部分是介绍毛泽东的著作，全党和人民群众为新中国而奋斗的史实，相对来说介绍得很少。(2)《联共(布)党史简明教程》以阶级斗争和党内路线斗争为中心。全书除军事斗争和党内斗争外，对于社会思想、文化教育、广大人民群众在革命和建设中的贡献，很少涉及或一带而过。在这种指导思想的影响下，中国共产党的第一个历史问题的决议，实际上就是以路线斗争为纲写成的。“文化大革命”期间，曾把中共党史撰写成10次路线斗争史。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有一定的改进，但阶级斗争扩大化和路线斗争绝对化的影响，在中共党史的研究中还没有完全消除。(3)《联共(布)党史简明教程》罗列党的各种会议和文件。全书写了苏共17次代表大会，并写了许多次党的代表会议和苏维埃代表会议以及这些会议的文件。在它的影响下，中共党史民主革命时期也将党的7次全国代表大会、几次中央全会作了详细介绍，社会主义时期的党史写的会议更多，对于会议决议的实践情况，反而介绍得很简单。一部中共党史，出现了“文山会海”，读起来十分沉闷。(4)《联共(布)党史简明教程》把对历史事件和人物的分析简单化，绝对化。全书许多地方对历史事件和人物轻易定性，好就是绝对的好，坏就是绝对的坏，非此即彼，客观分析

不够。中共党史也有类似的情况，强调党史是党性很强的科学，有时忽视了历史的客观科学性，对某个人，由于他后来出了问题，也就不敢提及他以前曾经作出的贡献。(5)在体例和框架方面，中共党史也以《联共(布)党史简明教程》为范本，从章节安排到经验教训的总结，往往雷同。有的党史工作者说，《联共(布)党史简明教程》对中共党史研究的消极影响，最根本的是不按照历史科学而按照理论学科的要求来撰写党史，没有弄清楚学科的性质和研究对象，从而不能确立学科的体系和内容，不能确定指导学科研究的理论和方法，也不能确定学科研究和培养研究者的方向。

党史工作者还提出，由于中共党史从框架到内容都以《联共(布)党史简明教程》为范本，因此要提高中共党史的研究水平，必须否定原有的体系，探索具有中国特色的中共党史学科的新体系；在探索中共党史学科新体系中，应该允许各种体系构想的存在、比较和讨论。他们强调说，要彻底消除《联共(布)党史简明教程》的消极影响，是一个长期艰巨的过程，必须认真对待。

第二，关于中共党史研究的理论和方法问题。

首先是中共党史学科的性质。一种观点认为，党史学属于历史科学，因为党史学在整体上是史实为基础的，是一门实证科学，不是用抽象的哲理来说明问题。另一种观点则认为，党史学既是历史科学，又是政治理论学，因为党史研究对现实政治有直接的干预作用，而现实政治对党史研究也有很大的影响，且党史学和政治学在内容上有重合之处。还有一种观点认为，党史学在目前尚未独立，不能称之为学科，它是现实政治的一部分。

其次是中共党史研究的理论。普遍认为，应当用马克思主义的史学理论来研究中共党史，过去由于没有遵循史学研究的理论，要求党史研究直接指导现实，就使得党史研究出现不符合史实的情况，主要解释领袖人物的著作与政治概念，并侧重于党内斗争，降低了党史的声誉。有的同志认为，延安整风时期，在研

究党的历史过程中，为了统一思想而主要总结党内路线斗争的经验，在当时是必要的，但以后就把路线斗争绝对化了。有的同志还强调，在运用史学理论研究中共党史中，必须避免机械地套用经济决定论和阶级斗争的理论。

再次是党史研究的方法。许多同志认为，现在的党史教学和研究，公式化现象非常严重，都是从“五四运动”到党的“十二大”，似乎已经形成一个习惯性的公式。古人写历史尚且有通史、专史、编年史、断代史之分，我们为什么搞得如此单调？他们主张党史研究的方法应该多样化，党史编撰的方法也应该多样化，不要从中央党校到县党校的党史教材都“千人一面”，应该将比较史学方法、历史合力论方法、逆向考察方法、系统论方法、计量史学方法、多面立体研究等方法引进到党史研究中来。

第三，关于中共党史研究的主要内容问题。

党史的主体是什么？一种观点认为，在一定社会心理形成基础上，偶然因素扩散到整个社会，就会左右社会的历史进程，因此历史人物决定历史行程的方向，党史研究的重点应该是历史人物对历史发展的作用，历史人物是党史主体。另一种观点认为，历史的主体应该是人民群众，历史人物要对历史发生作用，必须反映群众的要求，因此，研究社会心理比研究历史人物的个人心理更为重要。还有一种观点认为，社会心理与个人心理都不是凭空产生的，它仍然是社会存在的反映，因此，研究党史不能孤立地局限于党史的范围，应该和社会史的研究相结合，要深入剖析中国现代社会的经济结构，细致地探讨中国近现代阶级力量的组合分离情况，在这样的基础上去分析社会心理和历史人物的个人心理。

在党史研究的对象问题上，有的同志认为，应该用整个党的发展过程作我们的研究对象，应研究党的产生、壮大和党领导中国工人阶级和各族人民群众进行革命和建设的过程，包括研究马